

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

张华初 刘胜蓝*

摘要: 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表明,流动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比城镇居民高9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对收入缺乏弹性。就业减少了流动人口即期的不确定性,而社会保险减小了他们远期的不确定性。处理效应模型显示,失业显著减少了流动人口的消费,而在流入地参加的社会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对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促进流动人口消费的重心应为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与保障,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在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的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的就业培训、让流动人口享受到流入地更多的社会保障是促进消费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消费;处理效应模型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越来越多:2015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53亿人。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往往被视为“生产的工具”,他们总是与劳动过程联系在一起(沈原,2006),但消费是流动人口生活的重要内容,研究流动人口的消费可以更好地了解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消费是一个远没有被充分开发的潜在市场,扩大流动人口的消费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意义重大。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市民化速度将会越来越快,而“农民工的市民化将创造一个消费巨人”(蔡昉,2010)。

与流入地城镇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比较匮乏,大多数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工作不稳定。流动人口的即期消费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期望。如果他们对未来的收入有足够的信心,当期收入中消费比率就会大幅提高,反之当期消费比率就会大幅下降。自中国经济转轨以来,大量研究表明传统的西方消费理论已经很难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许多学者试图从不确定性这一角度来考察中

*张华初,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510006,电子信箱:joshua1971@126.com;刘胜蓝,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510006,电子信箱:srluishenglan@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城镇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2AZD026)和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编号:2014ssxm6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近年来,把不确定性引入实证分析是消费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流动人口的就业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其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就业的不确定性,失业对他们消费的影响较大,本文主要从失业风险的角度来考察不确定性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进行说明并对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收支情况和工作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建立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分组检验;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西方宏观消费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微观消费基础向宏观消费理论拓展,另一种是把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分析延伸到不确定性分析(汪浩瀚,2006)。不确定性是转型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宏观层面上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变动,微观层面上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等(庄佳,2006)。不确定性作用于消费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产生预防性储蓄,即减少当期消费以备未来不时之需;另一条途径是流动性约束,即消费者可能借不到钱,他们只有更加省吃俭用,流动性约束更加强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

城乡居民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目前已有一些实证方面的文献。经济转轨时期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过快的储蓄增长(赵晓英等,2007)。流动性约束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都能使城乡居民产生预防性储蓄(杜海韬、邓翔,2005),不确定性也可影响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万广华等,2001)。失业风险是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之一,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收入上涨对消费有正向影响,而失业率对消费有负向作用,且失业率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力远大于工资的增长率(周吉梅、舒元,2004)。上述文献的研究对象要么是城镇居民,要么是农村居民,流动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强,不确定性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其研究意义更强。

流动人口就业的临时性和非正规性导致他们就业的不稳定。一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变化频繁,每人平均不到一年就变换工作(吴红宇、谢国强,2006)。还有一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首次就业一般三个月就辞职,流失率高于40%,就业稳定性差(韦芳芳,2010)。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将空前加大,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也有新的要求。目前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年,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分别需要10.4年和13.3年,农民工目前的受教育程度过低(蔡昉,2013)。产业的结构调整将给流动人口的就业带来较大的风险,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就业的不稳定性,也即失业风险。

与城镇职工不同,流动人口中享有失业保险的比率非常低。《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比率2008年为3.7%,2011年为8%,2013年仅增加到9.1%。失业期间他们也很难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没有收入来源他们只能靠以前的积蓄,或者靠私人借贷过日子。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的消费影响较大,更加强了他们进行预防性储蓄。

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必要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进行研究,其面临的失业风险可用失业率随时间的变动量来衡量(周吉梅、舒元,2004),也可用失业(丧失工作)的百分比或发生率来衡量(张展新,2006)。前者是一个宏观的分析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是

流动人口的微观数据,故采用后者的方法来对流动人口面临的失业风险进行研究。本文在分析全国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微观风险因素和人口学特征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影响流动人口消费支出的基本模型,用于分析流动人口的消费。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一)全国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本文的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年龄在 15 至 59 周岁、非流入地(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该调查主要收集了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医保、婚育等情况,抽样方法为多层、分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

此次调查共抽取了 198 795 个样本,由于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已经工作或者失业^①的流动人口,在未工作原因中删除由于丧失劳动能力、退休、料理家务或带孩子以及怀孕或哺乳的样本,最后得出的有效样本量为 182 247 人,其中失业人数为 8 065 人,占总有效样本量的 4.43%,该数字略高于《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的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4.05%。

表 1 列出了有效样本(即工作或失业的流动人口)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4 岁,约 60% 的人为男性,75% 的人为已婚,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85% 的人为农业户口,一半以上的人为跨省流动,外出流动时间平均为 4.6 年。在各类社会保险中,在老家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最多,达到 71%,而在流入地参加失业保险的流动人口只有 13%。

表 1 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样本数 = 182 247)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年龄(岁)	15	60	33	33.746	9.312
性别(参照组为女性):男性	0	1	1	0.581	0.49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0	1	0	0.144	0.351
初中	0	1	1	0.540	0.498
高中及中专	0	1	0	0.218	0.413
大专及以上	0	1	0	0.098	0.297
户口性质(以农业为参照):非农业户口	0	1	0	0.147	0.354
婚姻状况(以未婚、丧偶、离婚为参照):已婚	0	1	1	0.745	0.436
家庭未成年人口数量(小于 18 周岁)	0	6	0	0.553	0.730
家庭老年人口数量(大于 59 周岁)	0	2	0	0.010	0.109
外出流动时间(年)	0	50	3	4.597	4.718
是否跨省流动(以省内流动为参照)	0	1	1	0.528	0.499
是否拥有自住房(以租房为参照)	0	1	0	0.239	0.426
参加保险情况(以未参加保险为参照):					
在老家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	0	1	0	0.237	0.425
在老家是否参加新农合/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0	1	1	0.708	0.455
在老家是否参加失业保险	0	1	0	0.011	0.106
在老家是否参加工伤保险	0	1	0	0.017	0.128
在流入地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	0	1	0	0.169	0.374
在流入地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0	1	0	0.191	0.393
在流入地是否参加失业保险	0	1	0	0.130	0.337
在流入地是否参加工伤保险	0	1	0	0.193	0.395

^①问卷中的问题是“调查前一周是否从事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

(二) 流动人口收入和支出情况

2013年流动人口平均每月家庭总收入为5237元,平均每月消费2478元,平均消费倾向为47.3%。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49.5%。相比而言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

如表2所示,流动人口的总体消费需求层次不高,消费支出主要花在食品支出方面。在流动人口每月平均总支出中,食品平均支出为1084元,约占总支出的43.8%。《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3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7%,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都远低于流动人口的恩格尔系数。流动人口住房支出为567元,约占总支出的22.9%,食品支出高于住房支出。

表2 2013年流动人口收入和支出情况

变量名称(单位:元)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上月(上次就业)收入	171 697	480	38 000	3 000	3 241.828	2 278.02
月食品支出	181 152	100	6 000	1 000	1 084.203	692.835
月房租	177 547	0	20 000	320	567.279	755.041
家庭在流入地总支出	181 228	300	25 000	2 000	2 477.602	1 742.066
家庭在流入地总收入	180 727	900	80 000	4 500	5 237.057	4 480.538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

(三) 流动人口就业情况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谋求更大的经济收益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所以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比较高,达到95.6%。

表3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工作时间为4.9年,每周工作时间集中在6.3天左右,平均每天工作9.4小时,高于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但分布较为分散。

表3 流动人口工作时间

变量名称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上周是否从事工作(以未工作为参照)	182 247	0	1	1	0.956	0.206
在流入地连续工作时间(年)	174 182	1	38	3	4.917	4.506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天)	174 182	1	7	7	6.321	0.844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小时)	174 182	0.8	18	9	9.442	1.889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

此外,对流动人口的工作性质、单位性质和主要职业的统计分析表明:在流动人口的工作所属行业性质中,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吸引的流动人口相对最多,分别占到了23%和20.1%;其次是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分别为14.4%、11.4%和8.9%;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占比最少,不到0.5%。流动人口就业的单位性质相对集中,43.1%的流动人口为个体工商户,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有31%,无工作单位的为10%,在日韩企业工作的人最少。流动人口从事的主要职业依次为经商、其他商业和服务业、生产和餐饮,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或者企事业单位做负责人的最少。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就业所属行业的风险性较高,就业不稳定性较强。

四、模型设定与估计

(一) 模型设定

按照预防性储蓄假说,如果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加大,预防性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重就

会提高,从而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预防性储蓄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是对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的重要拓展。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也称为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一般是不可直接观测的,因此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其代理变量。度量收入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的不确定性,可以用被调查对象失业与否作为代理变量。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本文考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家庭的人均月支出和人均月收入。为此将流动人口家庭每月总支出(收入)除以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同住家庭成员总人数计算得到家庭人均月支出(收入),并对其取对数。因此流动人口所采用的消费函数可表示为:

$$\ln C = \alpha + \beta \ln Y + \theta Z + \lambda UC$$

式中: C 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家庭的人均月支出, Y 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 Z 则代表家庭特征,主要包括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家庭总人数)、家庭结构变量(未成年人比例、老年人比例), UC 指的是流动人口家庭中被调查对象是否失业。其中, UC 并不是一个随机行为,而是由被调查对象的学历、年龄、性别和从业经验等经济社会因素决定的。换言之,流动人口是否失业是一个内生变量。如果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含有内生的解释变量将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而且非一致。本文用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effect Model)来估计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

本文设定的模型为:

$$\ln C = \alpha + \beta \ln Y + \theta Z + \lambda UC + \varepsilon$$

$$UC = \begin{cases} 1, & \text{如果 } W\gamma + \mu > 0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式中: UC 取1表示失业,取0表示未失业。 W 是影响流动人口失业与否的一组经济社会变量,是一个内生变量。 γ 为各变量的系数向量。残差项 ε 和 μ 的相关系数用 ρ 表示。如果统计检验拒绝 $\rho=0$,那就证明 UC 的确是一个内生变量,模型设定就是正确的。

(二)主要估计结果

为对比分析本文建立了两个模型,模型(1)考虑了失业风险对消费的影响,所用估计方法为使用稳健标准误进行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2)采用处理效应方法估计失业风险对消费的影响。处理效应模型的主方程就是模型(2),处理方程即表4中的模型(3)。模型(2)中两个方程残差项相关系数是0.541,在1%的水平上拒绝相关系数为0的原假设。这说明模型中不可观测因素增加了失业风险但减少了家庭人均消费,应该选用处理效应模型。

前文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消费倾向为47.3%,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模型(2)显示,2013年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只有0.67。有研究表明1980-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弹性为0.899(张邦科等,2011),相比而言流动人口的收入消费弹性较低。目前对于流动人口的消费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要目的是挣钱回家,所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尽量少消费。第二种认为消费是实现社会认同的一种手段,流动人口通过提升消费来达到城市认同的目的;在消费水平上,流动人口会拿出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消费,在消费结构上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且扩大了在休闲娱乐方面的开支(王雨磊,2012)。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流动人口的消费正处于第一种向第二种转变的阶段。

模型(1)和模型(2)都显示社会保险对流动人口的消费有显著影响,在老家参加的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有负面影响;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对消费的影响基本为正,工伤保险对消费的影响为负,与近期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董昕、张翼,2012)。这验证了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观点,在流入地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减小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少储蓄,进而增加即期消费。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人相对其他人而言即期面临的风险较大,该保险并不足以抵消其工作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卢海阳,2014),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因此消费降低。在老家参加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越多,将来返乡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会减少即期消费,增加储蓄或者将钱汇回家。这表现出我国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既符合凯恩斯的即期消费理论,也符合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流动人口消费并不是为了当前阶段效用的最大化,即已不再呈“短视性”(余永定、李军,2000)与阶段性特征。此外,从模型(2)和模型(3)还可以看出,年龄越大,失业风险越低;男性相比女性失业风险较低;相比未婚者,已婚者失业风险更低。家中老人和未成年子女人数越多,人均支出越少,意味着其生活质量越差。

表 4 主要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人均支出	模型(2) 人均支出	模型(3) 失业风险
被解释变量	人均支出	人均支出	失业风险
解释变量			
被访对象年龄(以15~26岁为参照):			
26~33岁	0.048***	0.031***	-0.355***
33~41岁	0.047***	0.012***	-0.416***
41~60岁	0.012***	-0.031***	-0.355***
被访对象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男性	0.005**		-0.055***
被访对象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初中	0.050***		-0.190***
中专或高中	0.112***		-0.203***
大学专科及以上	0.191***		-0.429***
被访对象户口性质(以农业为参照):非农业户口	0.071***	0.118***	0.162***
被访对象婚姻状况(以未婚、丧偶、离婚为参照):已婚	-0.104***	-0.129***	-0.350***
是否拥有自住房(以租房为参照)	-0.084***	-0.077***	
流入范围(以省内流动为参照):跨省流动	-0.062***	-0.069***	
在流入地居住年限	0.004***	0.005***	0.021***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0.661***	0.672***	
流入地家庭未成年人数(小于18岁)	-0.013***	-0.013***	
流入地家庭老年人数(60岁及以上)	-0.069***	-0.068***	
在老家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027***	-0.027***	
在老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029***	-0.031***	
在老家参加失业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017	0.033**	
在老家参加工伤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028***	-0.019*	
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044***	0.054***	
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003	0.004***	
在流入地参加失业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069***	0.083***	
在流入地参加工伤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	-0.123***	-0.126***	
被访对象失业状况(以就业为参照):失业	-0.022***		
被访对象失业发生比		-0.509***	
常数项	1.883***	1.923***	-1.136***
Adjusted R ²	0.524		
ρ		0.541***	
χ^2		194057.49***	
对数似然函数值		-123115.34	
样本量	180 236	180 236	

注: *、**、*** 分别表示 5%、1%、1% 的显著性水平。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或增加变量来检验处理效应模型的稳健性。首先,将总支出拆分成食品支出、住房支出和食住之外的其他支出三部分,分别使用家庭人均食品支出、家庭人均住房支出、家庭食住之外的人均其他支出代替其在流入地的家庭人均总支出,得出的结果如表 5 的模型(1)、(2)、(3)所示;接下来,在原模型中加入控制其他因素的变量,考虑到流动人口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其就业,于是在处理模型中加入流动人口目前持有证件情况,得出的结果如表 5 的模型(4)所示。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娱乐教育交通等支出较少,食品支出占据其支出的主要部分。从模型(1)、(2)、(3)的结果可以看出,将人均食品支出、人均住房支出和人均其他支出作为替代变量得出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且三者的系数绝对值依次增大。这意味着失业风险更大程度上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其他支出、住房支出,最后才是降低其食品支出。

模型(4)表明,当加入流动人口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情况时,发现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会使失业风险降低,且失业对于消费的负面影响依旧是显著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①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被解释变量	人均食品支出	人均住房支出	人均其他支出	人均支出	失业风险
解释变量					
是否持有居住证/暂住证 (从未持有为参照)					-0.193***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被访对象失业发生比	-0.713***	-1.066***	-1.172***	-0.490***	
ρ	0.536***	0.582***	0.664***	0.523***	
χ^2	83733.96***	60199.04***	60008.90***	193242.58***	
对数似然函数值	-173258.7	-205611.96	-216805.43	-122956.76	
样本量	180 090	152 277	162 315	180 236	

注:***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四) 分组检验

不同户籍性质和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对其消费的影响可能因人而异,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其家庭成员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对消费的影响也可能互不相同。本文先将全部样本按户籍性质分为农业户籍人口和非农业户籍人口,按流动范围分为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进行分组检验,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6 的模型(1)和模型(2)所示。接下来将全部样本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排序,去掉前 5%和最后 5%的样本,并按照中位数分割成相对低收入组和相对高收入组,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 7 的模型(3)所示。

表 6 的结果表明,不同户籍性质和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对消费的影响均为负,且参数都是显著的。其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失业对消费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业户籍人口。从不同流动范围来看,失业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和跨省流动。这可能与非农业户籍人口或者省内流动人口较高的消费惯性有关。表 7 的结果表明,失业对不同收入的流动人口的消费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对于低收入流动

^①这里只列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他结果可以向作者索要,下同。

人口的消费负面影响更大。

表 6 子样本回归结果 I

变量	模型(1)		模型(2)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跨省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被解释变量					
被访对象失业发生比	-0.502***	-0.520***	-0.463***	-0.552***	-0.466***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0.531***	0.568***	0.477***	0.601***	0.552***
χ^2	149124.17***	34879.41***	94073.27***	60974.65***	40394.37***
对数似然函数值	-105402.68	-17537.328	-66397.865	-33529.833	-22402.726
样本量	153 890	26 346	95 041	51 358	33 837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表 7 子样本回归结果 II

变量	模型(3)	
	相对低收入组	相对高收入组
被解释变量		
被访对象失业发生比	-0.492***	-0.336***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ρ	0.575***	0.383***
χ^2	96205.24***	59449.77***
对数似然函数值	-57758.687	-47045.548
样本量	86 397	77 356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从失业风险的角度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流动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恩格尔系数比城镇居民高9个百分点。处理效应模型显示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对消费缺乏弹性,只有0.68。失业显著减少了流动人口的消费,而在流入地参加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对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已不再呈现“短视性”特征。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对失业风险的抵抗力更弱。

大部分流动人口就业单位为私营或个体经营,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也比较少,失业风险是流动人口无时无刻不面临的风险。而由于户籍限制,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无法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失业保障,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导致流动人口在面临失业时只能靠压低生活消费来勉强度日。流动人口应该积极参加就业培训,增强自己的就业能力以提高收入水平。《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率是32.7%,接受技能培训的流动人口还是偏少。从政府层面来看,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和完善对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尤其是正规的短期职业培训;再就业服务等劳动力市场项目也可普及到流动人口,加强再就业服务水准(张燕、王元月,2008)。从企业层面来讲,按现行政策规定企业可以在成本费用中按工资总额1.5%的比例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用于职工技术培训和素质培训等方面的支出。而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工资薪金总额2.5%以内部分属于免税范围;超过部分也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企业应该用好这项政策,以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流动人口而言就业的稳定性是最大的民生。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提高他们的就业保障,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对城市治安和社会稳定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章元等,2011)。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让流动人口享受到流入地更多的社会保障是促进其消费的重要措施。《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的比例分别为15.7%、17.6%、28.5%、9.1%和6.6%,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参保率还较低,享受的社会福利较少。流动人口为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理应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1985-2009年农民工数量增加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9.96%,对总产出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41%。然而,农民工对经济成果平均分享率只有9.65%,对经济成果平均额外分享率只有5.81%,远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杨晓军,2012)。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极不公平的政策制度。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使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能够得到“平等的财政对待”(Buchanan,1950)。短期来看,国家和省级财政在制定转移支付方案时,应改变主要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做法,逐步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资金划拨方式;从长远来看,还应建立市民化公共成本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担机制,做到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从而成功地将流动人口纳入市民社会保障范围。

参考文献:

- 1.蔡昉,2010:《农民工市民化将创造“消费巨人”》,《第一财经日报》12月24日。
- 2.蔡昉,2013:《农民工就业面临各种风险》,《农村工作通讯》第9期。
- 3.董昕、张翼,2012:《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4.杜海韬、邓翔,2005:《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状态下的预防性储蓄研究——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经济学(季刊)》第1期。
- 5.卢海阳,2014:《社会保险对进城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4期。
- 6.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7.万广华、张茵、牛建高,2001:《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第11期。
- 8.汪浩瀚,2006:《微观基础、不确定性与西方宏观消费理论的拓展》,《经济评论》第2期。
- 9.王雨磊,2012:《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南方人口》第4期。
- 10.韦芳芳,2010:《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特征分析》,《淮海工学院学报》第7期。
- 11.吴红宇、谢国强,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南方人口》第2期。
- 12.杨晓军,2012:《农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与成果分享》,《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13.余永定、李军,2000:《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14.张邦科、邓胜梁、陶建平,2011:《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研究:1980~2008》,《统计与决策》第17期。
- 15.张燕、王元月,2008:《中国最优失业保险水平设计的经验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 16.章元、刘时菁、刘亮,2011:《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经济研究》第2期。
- 17.张展新,2006:《城市本地和农村外来劳动力的失业风险——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发现》,《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18.赵晓英、曾令华、徐国梁,2007:《经济转轨时期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消费经济》第2期。
- 19.周吉梅、舒元,2004:《失业风险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20.庄佳,2006:《不确定性影响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情况》第8期。
21. Buchanan, J. M. 1950. "Federalism and Fiscal Equ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4): 583-599.

The Impacts of Unemployment Risk on Migrants' Consumption

Zhang Huachu and Liu Shengl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2013,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consumption of the migrants, and we find that the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in this group i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nation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while the former's Engel coefficient is 9% higher than the urban dwells, and the migrant family income on consumption is inelastic. Taking up an occupation could reduce the short-term uncertainty, while social insurances could decrease the long-term uncertainty. The Treatment-effect Model shows tha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onsumption will be observed if the migrant lost his/her job, whil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consumption. The migrants' consumption does not present "myopic" feature anymore. So the focus to promote migrants' consumption is to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and social insurance, so a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celerating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ining the migrants to get more job skills, as well as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social insurance in those population-inflow cities, are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boost consumption.

Keywords: Migrants, Unemployment Risk, Consumption, Treatment-effect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D11, J18, C10

(责任编辑:赵锐、彭爽)

(上接第40页)

27. Zhang, K.H., and S. Song. 2003.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4(4): 386-400.

Urban-rural Disparity,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Sun Jiuwen and Zhou Yulong

(Institute of Regional & Urban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approach of urbanization towards small and medium cities, especially towards counties,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of China. A mathematical model on labor migration is constructed here, and we analyze the Chinese county panel data from 2005-2011 by using system GMM estimation.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e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inders the labor migration, which in turn does harm to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Financial support promotes urbanization because of its bias toward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e employment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However, the bias of investment doesn't affec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bviously. This paper further runs the robust test with the quantity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which shows the conclusion above is credible.

Keywords: Urbanization, County City, Urban-rural Disparity, Labor Migration, GMM Estim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C33, C51, O18

(责任编辑:彭爽)